

《白门柳》研究丛书

诗， 在历史中

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

易文翔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白门柳》研究丛书

诗， 在历史中

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

易文翔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在历史中：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易文翔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
（《白门柳》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5-6345-6

I. ①诗…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550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服务电话：0771-209286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62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87 mm × 1 092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00千字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白门柳》研究丛书

策划：刘斯奋艺术研究中心

主编：陈志红

序

於可训

易文翔曾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现在虽仍在从事编辑工作，但似乎同时又重操旧业，兼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她新近完成的一部书稿《诗，在历史中——论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就是一个证明。在这部书稿出版之前，她嘱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我乐意为之，一则借此谈点读后的感想，同时也想说点我接触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的一点机缘。

新世纪之初，我应读者和出版社的要求，着手修订拙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这本书的初版只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修订版的重点自然是在此后的90年代。而90年代的创作有一个新的亮点，是长篇小说异军突起，这其中，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又是继80年代之后从万马军中杀出的一支劲旅。在数量众多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如何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作重点论述，这是我当时颇感犯难的一个问题。拙著虽然不是一部官修正史，但作为高等学校中文学科的基础课教材，入选的作品总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经过再三选择，反复权衡，最终我选定了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作为这一时期历史小说创作论述的重点。这其中就有刘斯奋的《白门柳》。其他两部则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虽然后两部作品未获“茅奖”，但我认为这三部作品各显特色、各具匠心，代表了这期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它们构成了一种“三足鼎立”之势，支撑着这期间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艺术大厦。我的论述重点各有侧重，《曾国藩》重点论其文化人格，《雍正皇帝》重点论其人性还原，《白门柳》的论述重点，则根据作者“揭示我国17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把新思想的产生作为最终的表现目的”的“创作立意”，重点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通过明末清初复社的活动，表明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政治理想实际上的不可为，必须重新寻找革新政治的出路，由此催生了一种新思想的萌芽。”“第二个方面是晚明社会政治腐败、朋党之争剧烈，统治者为政失聪，致使阉党余焰复炽，国势日渐颓唐的情势对一种新思想的产生所起的激发作用。”“第三个方面是明清之际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因素，对一种新思想的产生所起的孕育和催生作用。”我的论述显然是取社会历史的角度，虽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产生重要影响的题材本身的文化意味和作者的文化意识。

当代长篇历史小说，自《李自成》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关注的重点是历代农民起义，尤其是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等几次大的起义斗争。这是因为，历史上的这些农民起义，与现代农民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存在一种同质关系，需要而且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从《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到《李自成》的创作意在“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 and 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就是一个证明。后来由于社会变化和文化转型，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题材，逐渐由民间转向庙堂，由农民英雄转向帝王将相，尤其是清代的帝王生涯和后宫生活，更是一个时期长篇历史小说趋之若鹜的选材对象。虽然有些作品并非如《李自成》那样，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真实地”或“本质地”反映历史的小说，但在艺术上却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帝王外史等长篇类型有一脉相



承的关系。这种类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多受古代长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偏重于民间的、大众的文化趣味，而较少顾及文人趣味和占中国文学主流的诗文传统，这种趣味“偏至”现象，就使得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或不能有效地继承、吸收、融汇、转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士”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传统，包括他们所崇尚的人生哲学、所信守的道德节操、所欣赏的艺术趣味，以及主要由他们所传承的诗、礼之教，和他们所擅长的琴、棋、书、画等文化技艺等等。因而也较少注意文人或“士”这一特殊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历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斯奋的《白门柳》弥补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这一重大历史缺陷，易文翔的研究，则为《白门柳》的这一历史贡献，提供了学术上的证明。

我所说的这个证明，主要是指易文翔的研究，不是用一般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而是用审美批评的方法，努力从这部作品中去挖掘、发现明末“士人”所负载的文化使命，所秉承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气质，如何通过作者独特的审美意识的作用，转化为作品的美感。这种美感既有作者对历史所作的审美观照，即将历史诗化所铸造的诗性，也有作品在形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意味。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所以整个作品确如易文翔所说，“处处飘逸着文化诗魂，流淌着浓郁的诗化色彩”。易文翔的研究，深得个中真味。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但使我们对这部小说独特的美学价值有深入的认识，同时也让读者通过研究者的指引，收获一种难得的审美享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易文翔对《白门柳》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就冲这一点，易文翔的这部论著就值得一读。

是为序

2014年12月2日写于武汉大学寓所

引言	// 1
第一章 文化之“根”	// 11
第一节 古典的审美维度	// 14
第二节 诗教传统	// 33
第三节 诗书画贯通融会	// 49
第二章 “史”与“诗”	// 79
第一节 现代的历史意识	// 84
第二节 文学想象的边界	// 109
第三节 文人心态史	// 133
第三章 诗性品格	// 149
第一节 诗性结构	// 156
第二节 诗意叙事	// 182
第三节 诗化语言	// 200
第四节 诗性，经典作品的品格	// 207
第四章 悲剧性审美	// 211
第一节 文化之殇	// 213
第二节 “破茧成蝶”	// 224
结语	// 228
参考书目	// 231
后 记	// 234



引言

一

刘斯奋所著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始创于1981年，作家用了16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三卷本125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夕阳芳草》出版后即广受好评，小说对明末清初社会细致而又准确的描述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甚至有论者称赞它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范本”。1997年，《白门柳》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从图书市场反映来看，这部小说亦反响良好。从第一部出版的年份1984年算起，至今30年的时间，小说再版重印多次，销售势头不减，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奖版”，五年内重印了12次。2005年《白门柳》入选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之时，据负责《白门柳》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骆军统计，从1997年全卷本首发开始计算，仅该社的发行量累计已达4万套，加上之前中国文联出版社和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量，估计远超20万册。进入21世纪，《白门柳》仍然得到读者青睐。2013年，读客图书推出最新一版《白门柳》（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一个号称“当今中国最会卖书”的图书公司，坚持“出品

的每一本图书，在上市之前都会经历超过半年的调研与策划，以保证本本大卖”的经营策略，它将《白门柳》纳入囊中，自然是看到了小说的市场魅力。2014年，《白门柳》走进台湾，由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推出繁体竖排版。从以上数据看，《白门柳》在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中，可以称得上是佼佼者。

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日益繁盛，数量不断扩充，而其中既能受到业内赞誉，又能得到读者青睐，且几十年不“过时”，被书商相中的作品，委实不多。《白门柳》能成为这种长销经典图书，自有它作为小说的艺术价值所在。然而另一方面，评论界以及研究领域对这部小说的关注却与其获得的肯定不相匹配，宏观评价居多，微观细致的分析较少，文本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在高产的当代文坛上，受评论界盛赞却被市场冷落、“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常见，市场上一时间“洛阳纸贵”却被业内嗤之以鼻的快餐式图书也屡见不鲜，然而，如《白门柳》这般能得到专业领域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但在评论界只是“点到为止”、学术批评“冷场”的经典之作，实在是少之又少。

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与当前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研究的惯性思维有关。从社会背景来看，这是一个信息时代，人们每天接受海量的信息，关注点变化频繁，就文学创作而言，一部佳作问世，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引起一时的反响甚至“轰动效应”并不太难，但如果想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获得长时间的“聚焦”则绝非易事。研究领域亦有追逐“时髦”、关注“新鲜出炉”作品的倾向，且有炒作嫌疑，各路人马抢占“先声”位置，博人眼球，快餐式批评常见。从研究的惯性思维来看，在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研究者习惯将作家与作品“绑定”，过于关注作家，有的时候这种关注更甚于对作品的关注，因此有意无意地“要求”作家的创作具备延续性，要求作家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不断制造话题，在这种积累的过程中实现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似乎一个作家著作等身则身价倍增，其作品也变得更有“价值”。而《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却不是按照这种轨迹行走的，他在创作《白门柳》之后，除了偶见的散篇，没有太多的文学创作面世，他把精力转向了书画领域，淡出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可以说，刘斯奋以“圈外人”的身份写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并没有因这部小说而进“圈”，其自始至终的“圈外人”身份大概也是《白门柳》

在圈内遇冷的原因之一。

然而，真正的研究是不应囿于这种思维的。作家创作的数量不是衡量作品研究价值的标准。巴尔扎克创作了近百部小说，其小说值得研究；曹雪芹只完成大半部《红楼梦》（一说曹雪芹完成了全本《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故散佚），但这大半部《红楼梦》已足以进入文学史，令后世研究者以毕生精力研精阐微，“红学”之形成即是明证。古今中外，作家仅凭一部小说成就经典，进入文学史的例子数见不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皆是如此，放眼国际，拉伯雷的《巨人传》、艾米莉·勃朗蒂的《呼啸山庄》、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等等，不一而足。一生只创作了一部小说或只有一部作品传世，这仅有的代表作成为经典，作者也仅凭一部小说在文坛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这些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黯然失色，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呈现出“经典”的价值，流传后世。这些作品都是作者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穷尽其毕生心血写作而成，这种经过反复打磨、凝结天才心血的作品，无惧时间、空间的变换，是人类文化的财富。

2005年，《白门柳》入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中国文库》。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出版宣言中称，该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这说明在《中国文库》编选标准下，《白门柳》被定位为经典作品。虽然《白门柳》是否如上述作品具备恒久的艺术魅力，尚需时间验证，但从近三十年的反响来看，《白门柳》也已经具备了经典之作的品格，小说的内蕴及其创作的形成值得我们去认真探析。

二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出：“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

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①研究《白门柳》的价值,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切入。

《白门柳》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我们首先将它放入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发展轨迹中,看看它在这一坐标中处于何种位置。

纵观中国历史小说发展,小说被视为“小道”,创作受制于历史,史学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有着权威性影响。中国的史学又是“宗经”的,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理论,史学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先例,经学的地位高于史学。被视为“补正史之余”的历史小说在“经”“史”构成的文化序列中处于附属之附属的低下地位,长期不入文化的主流。古代长篇历史小说除了以“演义”的方式补正史之不足,没有其他更好的创作方式。近代“小说界革命”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小说的文体地位,历史小说也从“正史之补”中解脱出来。现代中短篇历史题材小说便是在这种思潮下发展起来,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模式,“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②,把“现代人的生活内容,灌注到古代人身上去”^③。这些艺术探索为历史小说创作开拓了文学的空间,现代中短篇历史小说的繁荣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从“历史小说”的严格界定来看,这些小说更多的是借历史的躯壳传达现代人的情感或借古喻今,有的小说虽然取材于历史,但并非真正的历史小说,只是属于历史题材小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发展有限,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更是滞足不前,能称得上历史小说的作品寥寥无几,艺术水准较低。比如蔡东藩创作了十年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从秦汉写到民国,时间跨度两千余年,洋洋洒洒五百多万字,但重史轻文,过分依赖史实,沿袭《三国演义》所形成的历史演义小说旧制,小说未独立于历史,也未摘下“历史附庸”的帽子,更谈不上创作主体对历史精神的重铸,充其量是一部普及中国历史的读物。再如谷斯范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新桃花扇》,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新文学中唯一的长

①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② 鲁迅:《〈故事新编〉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③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卷5,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篇历史小说。小说改编于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在原著“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基础上，将小说的重点放在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的斗争上，作者借古讽今的创作主旨非常清晰，他在1957年重版《后记》中写道：“写这部作品的日子，正是蒋介石集团统治下最黑暗的年代，政治腐败，特务横行，那批祸国殃民的官僚、卖国贼，本质上与三百年前南明社会的腐败统治集团，极有相似之处。”所以，这部小说仍然落入了史实认识价值大于艺术审美价值的窠臼。

20世纪前半叶，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几乎是沉寂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姚雪垠《李自成》的出现。创作于50年代、出版于60年代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明末农民起义为主要线索，试图再现明末清初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和农民起义军由胜而败的悲剧结局，以及农民战争和历史运动发展的规律。姚雪垠以“深入历史，跳出历史”的创作理念，拓宽了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学虚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历史小说的普遍规律。但这部小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阶级论”过多地渗入，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也运用阶级的观点观察社会、分析他人，时代烙印明显；从历史研究到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因为作家过于“在意”史料而限制了文学的想象，因此出现史料丰富的后几卷在艺术审美方面反而不如史料相对匮乏的前两卷的现象，等等。这部小说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并没有带来长篇历史小说的“春天”。在“十七年”和“文革”期间，长篇历史小说仅《李自成》两卷，其他一些作品尚在创作阶段，如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星星草》、刘亚洲的《陈胜》等等，到新时期才陆续出版。总体而言，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非常冷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作家个人因素，也有大环境的因素。从大的方面来看，一是理论上的欠缺，没有成熟的历史小说理论建构；二是政治环境的制约，历史题材与意识形态敏感的牵涉（如5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批判之风），也使得文学创作对历史题材避而不谈。

20世纪80年代初，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转折，人们告别过去，开启新时期。“新的开始”，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但于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会在过去时代的轨道上“惯性”滑行一段时间，思想层面上的“新生”更不是朝夕之间便可实现。所以，尽管批

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批判的话语方式仍沿袭过去的模式、风格。就文学创作而言，创作的主体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他们迫不及待地运用所熟悉的“语言”“思维方式”对“文革”进行猛烈的批判，于是，与政治话语高度契合的揭示、反思“文革”的荒谬及其对“人”的全面伤害的文学成为创作的“主流”。这种文学创作，其创作主体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更多的是创作者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新时期之初文学的主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者都是属于“时代共名”下的文学。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经历思想巨变和话语重建之际，社会文化思潮处于拨乱反正、重新审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时期，虽然思想界、文化界已经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对文化展开批判，启蒙话语随之活跃，但主流意识形态仍显示强大的影响力，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仍然停留或纠缠于意识形态的制约之中。

《白门柳》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了。刘斯奋写作《白门柳》开始于1981年，第一部《夕阳芳草》于198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它是新时期最早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之一，展现了独特的历史小说风貌。小说中不见思维惯性、语言惯性的痕迹。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小说的题材所决定的，历史小说的创作似乎不那么注重时代话语，似乎可以脱离于时代。这种想法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并不符合创作实际。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虽然改变不了历史，但却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影响创作主体进入历史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跳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历史小说创作是轻而易举之事。就长篇历史小说而言，当时陆续出现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不少与《李自成》有着明显或潜在的相似，题材主题、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艺术手段等都呈现模式化的趋同，政治理念、阶级观点先行，掩盖了文学创作的本质。《白门柳》所走的显然是另一条路子，作家抛开了强加于文学的“阶级论”，将历史视为审美对象，发掘历史生活的诸多艺术之美；对待历史，他所热衷的不仅仅是“再现”历史，或者“以古喻今”，而是更倾向于理性思考历史，突破政治反思的视界，而向文化反思渐进，强化了历史叙述中的文化意识。这种创作已有了“自觉写作”的因子，相对于当时大部分作品所呈现的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这种创作的主体对历史

和现实的认识拥有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创作上具备更高的心理自由度与更广阔的胸襟，诸多外在和内在的限度被取消，故作家能进一步深入历史，不仅仅“再现”历史，而将渗入历史事实之中的文化蕴涵表现出来，同时，对于历史的理性思考又为文本增添了一道历史思辨色彩。正因为如此，《白门柳》呈现出与以往历史小说不同的文化意蕴，实现了创作向文学本体和艺术中心的回归。

在历史小说创作尚未大兴，理论尚需建构之际，刘斯奋没有陷入思想惯性、思维惯性、语言惯性等共同铸造的“时代共名”之中，而是走出一条迥异于当时主流文学的创作道路，为中国小说创作尤其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开辟一条别样的路子，将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从这一层意义上看，《白门柳》足以有它独特的研究价值。

三

当作家主体意识在创作中得到强化，外在因素对于小说的影响弱化，主宰小说艺术则主要凭仗作家本人的学识、气质、修养等个性化因素。从《白门柳》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以及博古通今的艺术修养。追索刘斯奋的文化背景，可知其从小精心研读中国古代经典作品，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经过现代高等教育，拥有现代精神和现代思想意识。另外，从其书法、绘画上的成就可窥见其精湛的艺术修养及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当这些素质凝结便为作家创作小说提供了寻求突破和创新的空间。

十六年磨一剑，鸿篇巨制《白门柳》，洋洋洒洒 120 多万字，其描写的历史时间跨度却不像传统长篇历史小说，动辄上百年、近千年，而是只写了三年的历史。《白门柳》选取了明清更迭动荡的历史时期，并集中于明清易代短短的三年时间（即明崇祯十五年三月到十二月，明朝覆亡前夕，内忧外患；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到次年五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及崩溃；清顺治二年六月到次年五月，南明鲁王政权在浙东建立到全线溃败），这是一个文学与历史交汇的最佳时间点。较之那些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整体或者风云人物一生命

运的宏观描述型小说，小说作者有意“独辟蹊径”，“曲径通幽”，避开了当代历史小说通常以帝王将相、农民起义等题材为线索的窠臼，脱离“大历史”叙事方式，将“大历史”作为背景，主要描写了天下动荡、风云变幻年代下“名士”与“名妓”的生活遭遇及命运选择。明朝末年，战火纷飞，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流寇”造反；奸臣当道，巧取豪夺；朋党相斗，尔虞我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士子”阶层，如钱谦益、冒襄、黄宗羲等或为仕途、或为救国，上下奔走；同时，在这“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情势下，唯有秦淮河上的画船，依然浮在水面上，听天由命，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等画船上的女子与“士子”之间纠缠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两个群体各色人物的命运沉浮共同谱写了一曲从奢华腐朽走向衰败的末世挽歌。“妓女”作为社会伦常规范的“边缘人”，与江南才子的儿女情长、恩怨离合为小说增添了细腻、凄婉的意蕴。“士子”作为统治阶层与黎民百姓之间“中间物”，他们伴随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而成长，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身处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焦点之上，急于显示其社会价值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身先天弱点，他们企图力挽狂澜却又无力回天的命运感贯穿始终，奠定了小说的基调。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士子”，在经受明末血雨腥风的洗礼之后，回归“文化”的角色，新的文化因子由此孕育，从而使得《白门柳》较之“怀古伤今”“香艳奇情”的作品又多出几分亮色。

刘斯奋在处理“小说—历史”这一历史小说创作根本问题时，选择了将“历史”与“诗性”融合，以“诗”观“史”，以诗性之思分析历史、结构小说，在历史与诗性的“双核”驱动下，实现独特的审美艺术追求，呈现独特的审美艺术风貌。简单地概括，作为历史小说，《白门柳》在选材上避开了当代历史小说中通常以农民起义、帝王将相等题材为线索的窠臼，书中既写到农民起义，也写到帝王将相，而其主要线索却是中国文学中较少关注到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的知识分子。名士与名妓的爱情生活在书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但是小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演绎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的层面，而是侧重于表现这两个群体分别所代表的不同生存理念的碰撞与融合。小说在塑造一批人物形象的同时，形成了整体的性格体系，反映出时代社会心理特征。在结构上，作者对“心



态史”叙事方式的探索，闯出了历史文学叙事的别样道路，他提出的“情绪主导情节”叙事方式，将叙事的重心由“故事”转变为“情绪”，并且，由人物的情绪来主导情节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在艺术表达上，小说处处飘逸着文化诗魂，流淌着浓郁的诗化色彩……可以说，作者把认识价值和审美的诗性作为主要的创作驱动力和目的追求，从而使小说在创作方面和文学史层面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白门柳》在开拓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小说充满诗性智慧的构思方式及其富有诗意的叙事在艺术选择和艺术呈现上都展示出独创性。本书的目的即是探讨《白门柳》的艺术构成，分析作家立足于传统文化之根，如何从历史中升华诗美之魂，并“通过话语构建，最大限度地揭示作品自身所具有的‘艺术深度和思想深度’”^①，藉此为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更多可能性在理论上做出一点探索。

^① 李咏吟：《诗学解释学作为反思性与创造性的科学》，《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